



第一辑
短篇小说

芨芨草

人做梦，都是迷迷糊糊的。

我最爱做梦。

人的梦有真有假。我的梦常常是真人真事的回忆。

今天我又做了个梦，回到了二十三年前。那年我五岁。那时候我看世界，总是迷迷糊糊的。

我爸爸把我接走了。

当时我住在张姨家。打我一记事起，我就住在张姨的家。

我没有妈妈。我想管张姨叫妈妈，张姨笑了，她说：“你原来有妈妈。”“那我要找妈妈！”张姨没说话，她搂住我，亲了我好几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妈早走了。自从我爸爸一当“右派”，她就走了，不回来了。我没见过妈妈的面。可“右派”是什么呢？我不懂。

张姨的家住在北京，一个大杂院。里面住了五家子，好热闹。一进大门，有个影壁；影壁前，有个荷花缸。荷花缸不种荷花，养鱼。我让张姨买了几条金鱼，在缸里养着。后来，金鱼让小花吃了。小花是只猫，跟我顶好。我一抱它，它就打呼噜。可是它偷吃金鱼，真坏！

张姨一家人都对我好。张姨的丈夫跟爸爸一样，是什么“地质队员”，老不回家。他跟爸爸是同学，张姨跟爸爸也是同学。爸爸一来，他们就高兴，在一起喝酒，吃鱼，有时还吃螃蟹。我不爱吃螃蟹，扎嘴。我爱吃张姨做的鱼，香香的，鲜鲜的。张姨说，这是他们家乡的“风味”。什么叫“风味”？我也不懂。

张姨有一个女儿，比我大一岁，我管她叫姐姐。张姨没有儿子，老管我叫干儿子。我说：“那我管你叫干妈！”她笑了，又搂着我亲一下。可是

她说：“你是个傻儿子，缺心眼，你还不如姐姐灵哪！”我不服。拍毛片、弹球儿，我都能赢姐姐。我就是跳房子不行，跳猴皮筋更不行。跳猴皮筋是女孩子玩的，我才不玩哪！

张姨挺忙，天天去上班。她到西四的地质部上班。她一出门，就把钥匙拴在姐姐脖子上，我们就去玩。玩着玩着，姐姐玩丢了，我进不去家，就坐在台阶上哭。

张姨带我们看过地质博物馆。那里有各种颜色的石头，黑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、金色的、银色的……什么颜色都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们放在玻璃框里，它们值钱吗？

地质礼堂一有节目，我们就去看。我看过《白毛女》，看过《闹天宫》，还看过《马兰花》。《马兰花》里的小白兔，比偷吃鱼的小花要好。

我们还去过北海、故宫、颐和园、动物园。我最爱去动物园。我喜欢熊猫、猴子、大鼻子象……什么都喜欢。我就是不喜欢大蟒。张姨说，大蟒专吃小白兔，我恨它。我很喜欢梅花鹿。张姨说，将来我到山里去，就能看见真正的鹿。

我们还吃冰棍，吃冰激凌；还买了气球，姐姐和我一人一个……

张姨对我真好。

所以我不走，不想离开张姨的家。我哭了。我看见爸爸、张姨、姐姐都哭了。

可是不走不行，因为这几年老闹灾荒，张姨的家越来越穷了。大院里的其他人家，也越来越穷了。

我们原来吃得多好！大米、白面、鱼、肉、菠菜、粉条，还有花生米。可是现在没有了。现在老喝稀饭，吃咸菜、窝头，还有掺糠的玉米面饼子。

爸爸直向张姨道谢，说：“都这样困难，我不能再给你们增加负担，就让他跟在我的身边吧！”

就这样，他把我带走了。

我不懂得什么叫“负担”，我可没有负担。

爸爸带我到草原上去。

我们坐火车，坐汽车，走了好远好远的路。我们洗不了脸，浑身都是土，吃的是干粮，喝的是洋铁壶的水。我累极了，汽车一停下来，我就睡觉。

我们终于到草原上了。好大、好大的草原哟！

人们都住在帐篷里，我和爸爸也住在帐篷里。大家管这个地方叫勘探队，有好多叔叔、阿姨，也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小朋友，我们一见面就认识了。

有一些叔叔、阿姨在帐篷里工作。他们总是写呀，画呀，还用手摇什么计算器。爸爸和他们都认识，可爸爸是“劳动”的，爸爸和工人一块儿出去，背上什么磁秤、重力仪，每天要走很远的路。

有时候，爸爸要出去好几天，就把我也带去。我可高兴死了，因为我可以在草原上痛痛快快地玩。

草原上净是草，各式各样的草；还有花，各式各样的花。花和草都有香味，我最爱闻这种香味了。

你们知道草原上有什么动物吗？告诉你，我没过几天就全知道了。

草原上有土拨鼠，在地里做窝，尾巴短短的，总爱在地上坐着。有四脚蛇，别怕，它一见人就跑。有狐狸、獾子、大头羊、野骆驼，还有黄羊。黄羊跑得可快啦！我看见一只狼追赶一群黄羊。那么多黄羊，打不过一只狼，真没本事。

我还看见了小鹿，不是梅花鹿。它们藏在树林里。对了，草原上也有小山岗，也有树林。那些树我叫不上名儿来。有一种小树结着紫色小浆果，酸甜酸甜的。

有树的地方就有水。大的水叫海子。我们路过一个好大的乌梁素海，有天鹅，美极了。工人们带着枪，可是都不打。爸爸说，天鹅是仙女变的，打它们是有罪的。

后来我们走得很远。后来我们见到了蒙古包。人高马大的蒙古伯伯，把我抱起来，说：“赛音，赛白闹！（好，你好！）”我不懂。

我在那里吃了奶干、奶豆腐，还喝了一口马奶酒。我的脸直红，直热。蒙古伯伯们哈哈地笑。

晚上，草原上升起又圆又红的月亮。月亮大极了，比盘子还大。

爸爸和蒙古伯伯、阿姨们好极了。他们点起一堆篝火，拉马头琴，唱歌。唱的歌叫《嘎达梅林》。爸爸说，嘎达梅林是蒙古人民的英雄。爸爸要我学嘎达梅林，将来为人民去打仗，死都不怕。

我真喜欢大草原，我永远忘不了它。

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，爸爸他们发现了大铁山。那座山是紫色的，从很远处就看见了。山顶上有一堆石头，上面插着树枝，爸爸说，那是蒙古人的“敖包”。“敖包”又是干什么的呢？

爸爸说，整座山都是铁矿，可以露天里开采，运出去炼铁、炼钢，再制造火车、汽车、拖拉机。哎呀，那么大的山，几百年也开采不完啊！我都替大人们发愁。

我从来没见过爸爸那样高兴过，他和工人在山上跳呀，笑呀，抱在一起摔开了蒙古跤。蒙古伯伯也来了，他也高兴。他用马驮来一只羊，我们晚上吃烤羊肉，满嘴里流油。又拉起琴，又唱起歌。爸爸站起身，朗诵了一首诗，直摇晃胳膊，嘿，就这样——“祖国呀！母亲呀！”样子真可笑。

后来又往前走，到了沙漠的边上了。全是沙子，全是。一刮风呜——变成了黑夜。爸爸他们就出来，把帐篷顶上的沙子抖掉。不抖掉，我们就要被埋死。呀，真吓人！

人们不敢在那里多待，很快就走了。所有的东西，都驮在骆驼背上。爸爸抱着我，也骑在骆驼背上。风太大，直呛鼻子，我就把头扎进爸爸怀里。爸爸可不怕，他跟着那叮当叮当的驼铃，老是唱一首歌：“看不到头的黄沙哟，走不完的道路。把梦驮在骆驼背上哟，迈着坚定的脚步……”我不懂它的意思，可是我都会背了。我听着歌儿，在爸爸怀里睡去。

沙漠里没有树，一棵都没有。只有一种草，一丛一丛的。它的叶子顶硬，能把人的手指拉出血来；夏天里，开着紫色的花塔塔。它不怕沙漠，它慢慢地向沙漠里长着，赶跑了沙子，开出了绿洲。

我问爸爸说：“它是什么呀？”爸爸说：“它就是爸爸。”我说：“它怎么是爸爸呢？”爸爸笑着说：“它不是爸爸，可是爸爸像它。它叫芨芨草，顶顽强了。它在前面开路，征服了风沙，后面就出现了绿洲。爸爸是地质

勘探队员，在前面探矿，后面就盖起了工厂。你说，爸爸像不像芨芨草？芨芨草是不是爸爸？”

我笑了，爸爸也笑了。从此我知道，芨芨草是最有用、最好的一种草。

我们在草原没有待上一年，又走啦！

我们来到四川省的一座大山。好大的山，好高的山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。

我们不住帐篷了，住在半山腰的一座大庙里。这座庙很大，有一排大殿，里面有好多个菩萨。殿门老锁着，我从窗户眼往里看，正中间的大菩萨是金子做的，眯细眼睛向我笑，可把我吓了一跳。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偷看了。

这庙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户人家，是个娶了媳妇的和尚。人们都叫他“门里师父”，我管他叫和尚伯，管他的老婆叫和尚婶，管他的两个儿子叫和尚哥哥。和尚伯长得胖胖的、圆圆的，总是眯着眼睛笑，跟前殿里的弥勒佛一样。他每天早早地起床，悄悄地念一遍佛经，然后就带上锄板去干活。他有好几块梯田，种苞谷，种红苕，还种菜。他待我好极了，一见到我，就用手摸我的下巴，说：“细娃子，你好吵！哪个长不高哟？喏，给你——”就从口袋里掏一样东西给我，有时是根鲜竹笋，有时是一把浆果儿，有时是一捧胡豆，还有一次——哎呀，我可高兴死了！——他给我抱来一只小猴儿，才有小花那么大。我把它养了起来，喂苞谷，喂果子，它也不跑。

这里全是山，近的山，远的山，愈远颜色愈淡，后来就跟云彩混在一起了。白天，我看山离得远；夜晚，山就离得近了。那么大的黑影，我都有些怕。

我要到树林里去，爸爸不准许。爸爸说，树林里有大山猫，有豹子，能吃人。我不敢去了，就跟和尚伯的小儿子在庙里玩。我们捉蜗牛，挖蚯蚓，还用树枝给小猴搭个小屋，让它做把戏。小猴真调皮，老对我龇牙，还挠过我。有时候，我觉得它又不及小花好。

我们还吃橘子哩！和尚伯种的。我吃了那么多，现在都不想吃了。

我喜欢四川这个地方，真好玩。

爸爸也喜欢。爸爸一来到这里，就不再背磁秤了。他和别人一样，背上帆布包，拿上小镢头，满山遍野去“普查”。什么是普查？慢慢我懂了，原来就是采石块、画地图。每天每天白天，他们去采石头，帆布包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石头，跟我在地质博物馆里看到的一样。每天每天黑夜，他们在马灯底下画地图。

来到这里的人不多，一共十三个。有一个炊事员、一个队长，其余都是普查队员。他们忙极了，中午饭都不回来吃。只有星期日休息半天，洗衣服，缝被子。洗衣服在庙后面，山崖缝里流出来泉水，汇成个池塘。有时候，池塘里出现了鱼，一吓唬，都钻进了石缝。山里的鱼可精了！

可是爸爸累出了病，一个劲地咳嗽。和尚婶挺关心，给他熬贝母汤。贝母是种药，这山里就有。

爸爸的病老治不好，人也瘦了，脸也黄了。我听叔叔阿姨们直劝他，让他在家里歇几天。那时他正看一张报，指着报纸笑笑说：“现在大家都学焦裕禄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不是更得学吗？”他还照样出去，爬山，采石头，晚上回家画地图。

我们在山里待了一年多，忽然，来了一个检查组。检查组的头头儿是个大干部，说话很冲，爱训人。我不喜欢他。

他把队员们召集在屋里，开会。我在门外偷偷地听。

他对大家说：“你们是怎么搞的？五千分之一的地质图到现在拿不出来，你们要拖到哪一天？”

普查队的队长说：“这里的山太陡，不好爬，比原来估计的要困难。”

他说：“现在又有了新任务，你们若是困难多，那就先撤走！”

队长说：“最好不要撤。用不了三个月，我们一定能完成。”

“那好吧！”检查组的头儿说，“再给你们三个月期限，一定得完成任务。”

队长说：“保证完成任务，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。”

就这样，普查队又留下来了。我觉得队长真带劲，像个解放军，不完成任务不算完。

这件事办完，检查组的头头儿又说了：“上级要抽调一个人，支援大西北，你们谁报名？”

人们都发了愣，可是爸爸举起手说：“我报名，我去支援大西北。”

队长问爸爸：“你近来身体不好，能行吗？”

我看见爸爸又是笑一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想只有我去好。”

开完会，检查组的头儿对爸爸说：“很好，你刚刚摘掉了帽子，应当有积极的表现。你准备行装吧，明天就走。”

这样，晚上爸爸就打行李，叔叔阿姨们都来帮忙了。爸爸对我说：“你把猴子还给和尚伯吧，咱们明天要走了。”

我哭了。我说：“我不走。叔叔阿姨们都不走，为什么你一人走？”

爸爸说：“乖孩子，听话！爸爸是去当芨芨草的，你不是说芨芨草最好、最有用吗？”

我没有法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走了。叔叔阿姨们，还有和尚伯，还有小和尚哥哥，一直把我们送到山坳口。

和尚伯说：“细娃子，二天你再来啊！”

我都没抬头，我哭得伤心极了。我想，我不是普查队员，我怎么回来呀？

唉，我的和尚伯、小和尚哥哥，我的小猴子、蜗牛、蚯蚓们！

又不知道走了多少天，我们来到了新疆这个地方。

我原来以为草原最大，现在才知道，新疆比草原更大、更大。

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地方：高山、峡谷、沼泽、平原，还有沙漠、戈壁滩。在沙漠的边上，我又看到了芨芨草。

嗨，芨芨草到处给人们开路。芨芨草，你多厉害呀！

我们一路上坐汽车，进了沙漠，就换上骆驼。爸爸又把我抱在骆驼背上，唱起那支我熟悉的歌：“把梦驮在骆驼背上，迈着坚定的脚步……”

这支歌我现在开始懂了。骆驼背上，是做梦的好地方，所以我就在上面睡觉。老睡，老睡，老也睡不醒。

后来又换上汽车，走呀，走呀，终于来到我们要来的地方。嘿，这里

可真好！远处的山戴着雪帽子，近处的山长满黑绿黑绿的塔松。山坡上的绿草像绒毯，还开着红色黄色的花。羊群走在山坡上，就像牛奶在流动。我觉得这里的天，比什么地方都蓝；黑夜里的星星，比什么地方都亮。

这里的人们，穿着顶漂亮的衣服。女人的头上，挂着好多珠子。爸爸说，他们是柯尔克孜人，是汉族人的好兄弟。

这里又是个勘探队。大家住的是木房子，用松木垒起来的。又宽敞，又干净，比北京张姨的家还好。

我可没想到，在这里见到了张姨一家人。这件事，爸爸也奇怪。张伯伯对爸爸说：“我们是被拔白旗拔到这儿来的。”我不懂，就问张伯伯：“这里有红旗，哪有白旗好拔呀？”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。

这个勘探队很大，盖了好几排宿舍、办公室、饭厅、伙房，还有一个随队小学校。秋天开学了，我进了一年级，姐姐进二年级。学生一共二十多人，有高有矮，分成五个年级，我一下子全认识了。

我们的学校只有一个校长，一个教员。教员不够的时候，就由勘探队的叔叔阿姨们来上课。张姨也来教过我们。她教书的办法最有趣。她把我们带到外面去，指着头上的蓝天，就教“天”；指着天上的白云，就教“云”。我们特高兴。

我的脑子有点笨，可是很用功。张姨说，只要我再用点功，就能赶上姐姐了。

我们最喜欢放暑假。一放假，老师就带我们进山去玩。我们在云杉树林里露营，采蘑菇，捉蝴蝶。有时候，柯尔克孜牧民伯伯转场来了，我们就去他们的毡房里做客。柯尔克孜大姐姐，穿着艾迪丽丝连衣裙、金丝绒背心，戴着绣花帽，好看极了。柯尔克孜的大哥哥们，敲着冬巴鼓，弹起库木兹，唱了好多好多的歌。他们唱雪山，唱冰川，唱那白色的羊群，还唱红色的海骝马。我都听出了神。

不知为什么，柯尔克孜的叔叔阿姨们特别喜欢我。他们说我的眼睛又黑又亮，像那喀什噶尔的河水。他们说，我不像汉族人，倒像柯尔克孜人。有一次我不舒服了，他们抱我到毡房里去休息。一个柯尔克孜大姐姐，乘我闭眼时来亲我。这我全知道，我的心中热乎乎的。

啊，我真留恋小学三年级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！

可惜，这些日子没有持续得很久。在我要上小学四年级时，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
我觉得，这时候一切都变了。叔叔阿姨们不再出去工作，全留在队里开会，喊口号，刷标语，贴大字报。来了一个工作组，被打倒了；又成立了几个造反团，互相打倒。我们的小学校，只好停课。好多小朋友，乘这时候到树林里去了，采蘑菇，捉蝴蝶，玩得挺痛快。

我可没有去。我看到几条大标语，把爸爸“揪”了出来。他陪着“走资派”挨斗，坐过几回“喷气式”。又过几个月，就由两名解放军押着，送到公盖尔林场去“劳改”了。

我大哭一场。我要跟爸爸一同去“劳改”。爸爸却皱着眉头对我说：“别哭了，我去的地方是不准小孩去的。领导上已经安排好，让张姨来照顾你的生活。你要听张姨的话，我会经常回来的。”

爸爸坐着卡车走了，他到公盖尔林场去照管林木、砍柴。每隔半个多月，他便亲自送回一车柴来。我看他晒得很黑，胡子拉碴的，穿一件旧蓝布褂子，补丁摞补丁。但是他精神很好，每回见到我，都带着笑容，叮嘱我说：“你别惦记我，那儿很好，我都不想回来了。你好好听张姨的话，要是你们的学校总不开学，说不定我会把你接过去。”

到了冬天，爸爸有一两个月没有回来。我着急了，问那送柴的解放军叔叔：“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送柴呢？”

解放军叔叔说：“是他自己不愿回来的。他忙得很，砍完柴，就到各处采矿石，画图。他说，大雪封山的时候，他一定回来看你。”

他只给我捎来这句话，可是他给张伯伯、张姨捎来好厚的一封信。张伯伯、张姨看了，急得直搓手，说：“咳，在这里瞎斗个什么？还不如到公盖尔林场去哩！”

真的，这时几个造反团斗得更凶了，连食堂都分成了两个。我们吃不上好饭食，光是干馒头、咸盐拌土豆、萝卜片汤。拌土豆噎得人够呛，直着脖子都咽不下去。

柯尔克孜人不来了，不到这里来住冬窝子了。我再也听不到冬巴鼓、

库木兹的声音了。

这时我非常想念爸爸，非常非常地想。

爸爸不是说，大雪封山时他要回来送柴吗？我就盼望下雪，数着手指头，天天盼望着。

国庆节刚过，这里就下雪了。我非常高兴。整天站在营地边上，望着远方的山口。我巴望那山口处出现一个黑点，越走越近，越走越近，那是爸爸的运柴车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终于看到山口处出现了一个黑点。这黑点迅速地扩大，扩大，很快地来到我眼前。这不是运柴车，是一辆空卡车，车上的人不是爸爸，是运柴的解放军叔叔。

“我爸爸呢？”我大声地问道。

解放军叔叔没回答，他把我抱进驾驶室，一直开车到张姨的门口。他紧紧地搂着我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别哭，你爸爸出事了！”

张伯伯和张姨都跑出来，大家把爸爸从车厢里抬下来。爸爸被两床被褥裹住，浑身是血，人已经僵了。张伯伯解开爸爸的棉衣，做了半天人工呼吸，也没用。忽然，张姨放声大哭了。

解放军叔叔说：“他一个人爬到山崖上去采石头，脚没把稳，从崖顶上跌下来了。”

我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是在张姨的床上。她紧紧地抱着我，轻轻地摇着我。

爸爸呢？爸爸呢？我向张姨哭号着。

……爸爸被埋在云杉树林的前面了。没有棺材，没有墓碑。小小的坟头，四围是黄色的、冬天里盛开的款冬花。

我扑倒在坟头上，哭着，像小鹿一样蹬着腿。我恨不得把坟头扒开，再见爸爸一面。

张伯伯把我抱起来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孩子，不要再哭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收留你，养活你，一直把你养大。”

晚上，他把我抱在他的床上，低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不是会背毛主席的书吗？‘为人民利益而死，就比泰山还重。’你爸爸虽然死了，可是他

给人民发现了一座矿山，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。”

说着，他拿出个信封对我晃了晃，这是爸爸写给他和张姨的信。当时，他们对我保密，后来我却看到了：

“我要非常感谢这次公盖尔林场的‘劳改’生活。谁都没想到，这恰好给我提供了地质普查的好机会。现在我向你们报告惊人的消息：我在卡布扎、沃克陶、巴音塔格几个山丘，全发现了S的天然露头。太棒了！仅凭这些露头，我就可以估计出它的C级储量，不会少于七位数字。我已采了若干矿样，藏在我的板铺下。由于我是‘劳改犯人’，不便于直接向领导汇报（否则，‘不务正业’的罪名会使我失去在这里的相对自由），所以，区区的功绩让给你们（一笑），请你们‘窥测方向’，等待时机，尽快派人来预探，以便确定B+C₁级的矿量。为了人民的利益，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……我的梦醒了，我又回到了二十三年后的现在。

现在，我骑着骆驼，正走在长满芨芨草的沙原上。

我二十八岁了，结了婚，妻子就是我的“姐姐”。我们一同在勘探队中长大，一同在武汉地质学院进修过两年。如今，都是熟练的地质工作者了。

爸爸的遗体，已经移回故乡安葬。他发现的矿山，正在进行建设。张伯伯与张姨，因为年事已高，调回北京去工作了。而我们却把勘探队的帐篷、毡房、吉普车、骆驼背，当作自己的家。

人各有志。人生的志向，是生活的经历炼成的。如果阿拉伯人的谚语说，“人生的欢乐是在马背上。”那我们要说，人生的幸福，是在勘探队的骆驼背上。

“把梦驮在骆驼背上，迈着坚定的脚步。”我永远忘不了爸爸唱过的歌。在沙原上给绿洲来开路，我永远忘不了芨芨草。

（《新港》1982年第8期）

景颇人的挎刀

一个景颇族的男子，能够没有一把挎刀吗？

不，我经过几百里的景颇山寨，没有发现一个例外。所有成年的景颇族男子，无论是脸色黑红的小伙子，还是鬓发皤白的老汉，他们都挎着一把刀。那或者是腾冲地区的马帮贩运来的，或者是托人从更远的地方——比如说藏族地区甚至国外带来的，然而绝大多数的，是本地区人们艳羡的“户撒刀”。这种刀的顶端是方的，外形就像这里的山野一样粗犷；它那革制的刀鞘，被人们绘上各种不同的花纹；它那硬木制的刀柄，结扎上各种色彩的绳穗。这把刀挎在景颇族男子的腰际——啊，我奉劝任何人不要悄悄地从背后去接近他，同他开玩笑，不要未打招呼就去拍他的肩膀，不然的话，一把刀流星似的回手一挥，你就会像茅草一样被无情砍倒。

这就是景颇族男人的挎刀！我在每一个竹楼中见过它，我在滴翠的山间小径上见过它，我在异国情调的边境市集上见过它，我更在“吃新谷”的节日舞会上见过它——那时节，月光使群山发白，篝火使草地发红，上千名的男子跳起刀舞，震慑住每一个观者的心灵。我甚至听见了劈刀时飕飕的风声，我甚至看见了这股风扇起来的篝火的火星。在篝火的红光照耀下，我看见了一张张兴奋的面孔。在这些张面孔上，呈现出炙人的南国的热情，也流露出明显的男人的自豪，因为他们所挥舞的挎刀，能够像银蛇一样地欢跃。

真的，一个景颇族男子，能够没有一把挎刀吗？

遗憾的是，年已六十的棍果业老爹，就还没有一把挎刀。正因为这一点，他总不愿在生人前抛头露面。当一个生人和他目光相遇时，他总要移开自己的目光，默默地走向一旁。

我不是一开头就发现了这一点的。我们的工作组进了三台山，差不多

过去了一个月，串过了七八个山寨，这才在一个山坳的小竹楼里，邂逅了棍果业老爹。

你可以把他形容为一株修直的山松，因为在身材不高的景颇人当中，他是十分魁梧的。他的眼窝深陷，鼻梁高耸，皮肤黄中泛白；岁月星霜，在他的脸上印下深刻的皱纹。但是他那花白的鬓发和眉毛，却依然是粗硬的。我们碰见他的时候，他穿着一身黑布衣衫，打着赤脚，正在自家的猪栏前喂猪。我们的工作组长、县农办副主任老龙同志呼唤他：“棍果业老爹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先用警惕的目光望望我们，然后和蔼地一笑，便默默地走开了。

当时，我觉得他的身上少了一些什么，但并没有细察。晚上，我们宿在生产队部里，队长派他给我们烧饭。这时，我看他随身带来一杆半自动步枪，而竟没有一把挎刀。我感到了奇怪，向老龙同志说道：“老龙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棍果业老爹竟没有一把挎刀！”

老龙似乎早已知悉，丝毫不感到奇怪。他悄声地对我说：“棍果业老爹原来是有一把刀的，后来失掉了，这中间还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哩！”

“什么伤心事儿？”我的好奇心上来了。

我们都知道：老龙同志是个“老边疆”。他本是宜良地区的彝族同志，自从1949年来到边疆，就在这里坚持工作。他走遍了本县傣族、景颇族、阿昌族、崩龙族的每一个山寨；他和这里的许多人都熟识。如果说他熟知棍果业老爹的身世，我是深信不疑的。

而老龙同志讲的确是一段伤心事情。“棍果业老爹，”他在我的耳边低声叙述说，“年轻时是个能歌善舞的小伙子，性情也比较开朗。他跳的刀舞，在附近山寨里是顶有名的。十八岁上，他在‘串姑娘’时认识了一个最美的姑娘。因为他没钱给丈人家送牛、送钱做聘礼，他只好‘抢婚’，把姑娘抢到七十里外的中缅边境上，在芭蕉林里搭了个竹楼过活。没想到，刚过了几年美满日子，姑娘就被当地的土司霸占了去。他愤怒地烧毁了土司的谷仓，结果被土司逮住，送到县政府里，一关关了七年。1949年，国民党残部向国外逃跑后，他被释放出来。他去寻找土司报仇，土司

早已跑到国外，而他那被霸占的妻子，也已不知去向。那时，棍果业悲伤到了极点。

“离开边境往回走时，他在一条僻静的山路上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。在路旁枝叶茂密的牛肚子果树下，横放着一个用麻布封住口的大竹篓。竹篓旁边，盘着一条七尺多长的青蛇。他折了一条树枝赶走青蛇，打开竹篓，原来里面盛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，还有十块银元和一柄名贵的拷刀，刀下压着一封汉文的信。他把这一切东西都扛回到自己的村寨中。

“他让人译读了汉文信，知道这封信是一个国民党军连长留下的。这个连长娶了个景颇族妻子，在向国外逃亡途中，景颇族妻子生下这个男儿，随后就得产后风死了。国民党连长不得不把婴儿抛弃，在竹篓里放些银元和一柄可以变卖的名贵拷刀。他在信里向‘过路君子’们乞求，希望有人‘大发慈悲’，把婴儿收为自己的儿子，那就‘功德无量’云云。棍果业正是这样一个好心人，他毅然决然地把婴儿收养下来。

“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艰苦的事儿！棍果业挨门去乞求哺乳妇女给婴儿喂口奶。作为交换，他给人们去砍柴割草。后来，他自己养了一头牛，就挤牛奶给婴儿吃。他就像你们汉族人说的：一把屎、一把尿地把孩子拉扯大。那时，棍果业三十五六岁了，他的性格大变了样。他变得沉默寡言，甚至有些孤僻。他决心不再娶妻，专心致志地抚养孩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堂牙。在堂牙七岁时，他花去全部积蓄，给堂牙打了个银项圈。人们都说：堂牙是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孩子。堂牙成了棍果业心上最大的骄傲。当然喽，还有一件东西也是棍果业的骄傲，那就是同孩子一同捡来的名贵的拷刀。这把拷刀与众不同——哦，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一种紫胶树么？就是那种依靠虫子向上爬的通道割胶的树。它的树胶是血红色的，可以用来刷家具，也可以用来粘刀柄，棍果业的这把拷刀的刀柄，就是用紫胶来粘成的。它的刀柄坚硬无比，刀刃更是锋利。要用它去砍柴呀，铁锨把粗的树枝，‘咔嚓’一下就断了。

“棍果业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。可是，世上的事情真怪，有时，你辛苦栽培的果树不结果，你耐心教育的孩子不长进。堂牙是个淘神的孩子，从小就不听话。他上学时逃学，干活时偷懒。从十六岁起，跟一帮‘串姑

娘’的青年们鬼混，有时竟跑到国外洋人街一带，搞些小小的走私勾当。棍果业像火神一样发了怒，像雷公一样叱骂他，还把手指粗的毛竹打断无数根，堂牙还是改不了。

“1967年，堂牙十八岁，我们这里也搞了史无前例的‘文化大革命’。谁也想不到，十八岁的堂牙竟成了全县造反头目之一。他把县里的领导干部都关进‘牛棚’，私设公堂，拷打干部。不瞒你说，我也挨过堂牙的板子哩！”

说到这里，老龙同志掠了我一眼，非常迅速地苦笑一下，又接着说下去：“人的思想真是难以捉摸。从前我想得比较简单，以为什么阶级出身就一定形成什么思想，其实并不都是这样。你看，棍果业老爹是多么好的一个人，可他的儿子就完全相反。那时，棍果业找到堂牙，命令他不要打人，不要关押干部。堂牙根本不听，反而派人把棍果业软禁起来。父亲和儿子就这样不一致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”

“堂牙是越干越邪乎。后来，他卷到全省的两大派斗争里去，带上一伙人，出去‘打游击’了。1972年，有人在怒江坝子上见过他，背一支崭新的‘56-1’式冲锋枪，威风得很哩！”

“但是，最后他并没有好下场。他欠下几条人命的血债，在各地地方都待不住了。1974年夏天，一个风雨之夜，他带领两个歹徒回到家中，先把棍果业老爹捆起来，然后换了衣衫，带走两竹筒糯米，趁黑夜跑了。临走时，抢走了棍果业老爹最珍爱的那把挎刀。”

老龙停止了叙述，好像这故事已经讲完了。他动手去从陶质的“兰刀”里倒水，以便润润自己的嗓子。

但我的好奇心并未得到满足。我又问道：“那么，堂牙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“下落不明啊！”老龙同志说道，“有人说，他在向解放军拒捕时，死在怒江里了；也有人说，他和两个歹徒钻进了人迹罕至的碧罗雪山。唯独棍果业老爹说，堂牙不会留在国内，他一定是跑到国外，加入了各国政府都要通缉的武装走私集团。人们问棍果业有何根据，他说，他是用自己的心感觉出来的。而我们这里的一些思想落后的群众，从宗教迷信出发，把